

【中东问题】

伊斯兰法的兴衰

敏 敬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公元7~10世纪中期, 是伊斯兰法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法体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 作为穆斯林帝国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 它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 促使阿拉伯帝国出现全面繁荣。但10世纪以后, 由于“创制大门”关闭, 伊斯兰法开始走向僵化封闭, 与现实严重脱离, 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是造成穆斯林世界普遍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斯兰法的兴与衰, 是穆斯林世界兴衰的重要衡量标尺。

关键词: 伊斯兰法; 穆斯林; 创制; 衰落

中图分类号: F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1-0087-04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Islam Law

MIN Jing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It was the firs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Law from the 7th AD. to the middle of 10th AD. At that time, Islam Law presented positive spirit and, as the main part of the superstructure of Muslim empire, pushed strongl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prosperities of Arab empire in every aspect. But after the 10th century, because of the shutdown of “the Door of Creat Law”, Islam Law began to be closed deadly. It separated from reality severely and didn't meet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y more. I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causing the decline of Muslim world.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Islam Law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ales to measure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Muslim world.

Key words: Islam Law; Muslim; law creation; decline

公元7世纪初, 正当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因长期战争而筋疲力尽时, 处在它们之间的阿拉伯半岛, 伊斯兰教却迅速崛起。穆斯林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向外扩张, 相继统一了半岛地区, 并击败波斯和罗马, 占领了西亚、北非等大片土地, 在很短时间内, 建立起了东起中亚, 西到马格里布、西班牙的庞大帝国。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 穆斯林帝国达到鼎盛, 伊斯兰文化进入辉煌时期。穆斯林的发展与强盛, 由多方面因素促成, 富有开放和包容精神、提倡创制的伊斯兰法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0世纪以后, 穆斯林世界普遍走向衰落, 同样与伊斯兰法

的衰落存在密切关系。这以后的伊斯兰法, 因为关闭“创制大门”, 而日趋僵化封闭, 遂渐丧失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伊斯兰法形成的早期特征

所谓伊斯兰法, 是指穆斯林社会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根据而制定的各项法律。伊斯兰法则是一门专门研究在遵循伊斯兰教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前提下, 如何从事立法工作的学问或学科。伊斯兰法与《古兰经》同时产生。《古兰经》和圣训中包含了大量规范穆斯林个人及社会关系的律例条文,

收稿日期: 2003-10-28

作者简介: 敏 敬(1972-), 男, 甘肃临潭人, 西北大学①中东研究所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东问题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但这些律例有的十分具体,有的却十分宽泛,而且数量有限^[1],人们远远不能按照生活需要从中找到一一对应的答案。伊斯兰教兴起初期,社会发展迅速,国家疆域不断扩展,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复杂,如何使伊斯兰法既满足现实需要,又不违背伊斯兰宗旨,成为穆斯林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于是出现一批学者,专门研究经训,探讨立法,伊斯兰法学因此而诞生。伊斯兰法学家从一开始就分为两派。其一为“圣训派”,这一派坚持立法工作必须以经训明文为准,没有经训明文,则立法无效。其二为“意见派”,这一派主张在缺乏经训明文的情况下,以经训精神为原则,运用“公益”、“类比”、“公议”、“择善”等方法进行立法。两派法学家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同时又彼此借鉴,相互影响,派生出众多新的法学派别。到公元10世纪,经过历史的淘汰,有四位法学家的学说最终取得统治地位,成为正统学说,它们以其创始人而得名,分别是哈奈菲学派、马立克学派、沙菲仪学派、罕百里学派。

早期伊斯兰法在推动穆斯林对外扩张、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伊斯兰法第一次使半岛及其他游牧社会生活状态从无序走向有序。前伊斯兰时代,这些地区迷信横行,社会混乱。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等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之间连年混战,人们的社会关系紊乱,血亲复仇现象严重。酗酒、溺杀女婴、恃强凌弱等陋习盛行;高利贷猖獗,阶级分化严重,严重阻碍了半岛地区社会发展。伊斯兰教兴起后,依照古兰经的训示,开始有步骤地全面改造旧的社会秩序。伊斯兰法首先反对高利贷和暴利剥削,号召减轻穷人负担,通过天课、施舍救济穷人,弥补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伊斯兰法确定了“穆斯林皆是弟兄”的平等思想,否定阶级特权,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增强社会凝聚力,使人们的群体意识突破狭隘的部落和地域限制,为阿拉伯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打下了思想基础。伊斯兰法针对前伊斯兰时代半岛混乱的社会关系,确立了新的婚姻制度和伦理原则。伊斯兰法规定,人们必须确定自己的异性伴侣,并在数量上加以限制;新法律要求一个男子最多只能娶四个妻子,如果对她们的做不到平等对待,则只能娶一个。新法使阿拉伯人混乱的血缘关系得以制止,而代之以文明有序的婚姻关系,阿拉伯人开始接受内外有别,合法与非法等伦理道德观念。当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地位得到确立,伊斯兰法又进一步

明确财产制度,妇女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第一次获得财产权和继承权。蒙昧社会中妇女没有人身权利,她们总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被任意买卖。伊斯兰法规定丈夫必须向妻子支付一定的聘仪,结婚和离婚都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法律禁止歧视和溺杀女婴,强调女人和男人同样享有生存权。有史以来,伊斯兰法使半岛第一次有了婚姻和两性权利方面的制度安排,为半岛跨入文明时代创造了条件。

古兰经还颁布了许多律例,限定人们的个人行为,使他们抛弃恶习,加强自身修养,讲究时间观念,忠守信用等。“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不要以别人的财产贿赂官吏……”^[2]“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故当远离……”^[2]。古兰经的这些规定,使桀骜不驯的阿拉伯人变得循规蹈矩,使他们由散漫放纵的民族一变而为雷厉风行、善于节制的民族。当穆斯林军队第一次走出半岛时,他们已凝聚成一支坚强的队伍。在他们面前,罗马和波斯军队首次节节败退。

早期伊斯兰法提倡创制,与时俱进,适应各地区发展需要。在“圣训派”和“意见派”两大法学派别中,“圣训”派法学家主要出自半岛地区,尤其是麦加和麦地那。他们的法学思想主要流行于半岛和北非等地区。“意见派”法学家主要产生于伊拉克等地区,如哈奈菲派创始人艾卜·哈尼发长期活动于伊拉克。“圣训派”和“意见派”的法学分歧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各自流行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特征。半岛地区是伊斯兰发祥地,先知和圣门弟子的活动大多在这里展开,人们对《古兰经》降示的背景和圣训的传述十分熟悉。他们过的主要是游牧生活,民风纯朴,生活简单,用《古兰经》和圣训明文基本能够解决问题。北非等地区居民情况与此相似,因此也十分欢迎圣训派法学,如马立克派。伊拉克等地则情况有所不同,那里远离半岛,对圣训和圣门弟子活动了解较少,但农业发达,文明程度较高,人们的生活复杂,经济、刑事、社会问题纷繁复杂,五花八门,所有这些是需要更加具体、细致的立法,来加以解释和处理,因此意见派在这里占据上风,备受推崇^[3]。圣训派和意见派的这种地区分布差异,反映出伊斯兰法对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训派”和“意见派”法学都在不断地自我完善,互相补充。它们的主要分歧不在于是否赞成法的“创制”,而在于对创制的方法、程度、规则和范围有不同意见。所谓创制,是指“具备创制资格的伊斯兰法学家依据《古兰经》、圣训的明

文与精神及伊斯兰法的基本原则、法律渊源、运用理智推理、比较判断等方法,对传述系统相对正确、字面含义相对明确的经训明文,以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经训明文未涵盖的新事物、新问题制定出与经训明文和精神及伊斯兰法宗旨并行不悖的法律的活动。^[4] 相比较而言,“圣训派”的创制活动比较节制,注重维护圣训的权威性,强调创制必须有圣训明文依据;“意见派”则强调“圣训”的精确性,为保持谨慎,该派法学家较少使用圣训,而重视发挥经训内在精神,并结合人的理智,用逻辑、推论等方法提出立法意见。总的来说,意见派的创制多于圣训派。但无论如何,两派均在自己的法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发展,进行创制,都能面对迅速扩展的帝国疆域和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新事物提出相应意见,制定出卓有成效的法令律例,使帝国的上层建筑不断改进更新,成功应对时代的挑战。

早期伊斯兰法还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表现在它并不是一味教条地挪用经训,排斥非伊斯兰法律。非伊斯兰法律主要指前伊斯兰时期存在于半岛及被征服民族地区的法律。这些法律中绝大部分是习惯法,以惯例的形式为各地区原住民所遵守。穆斯林征服这些地区后,除了采用其原来的典章制度(如波斯和罗马的行政制度、财政制度等)外,对习惯法也实行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和利用。穆斯林法学家依据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经训精神,对各种习惯法加以鉴别,或予以淘汰,或加以吸收。被吸收部分,便成为伊斯兰法的组成部分,获得合法地位,历史学家称这一过程为法律的“伊斯兰化”。^[5] 习惯法伊斯兰化,丰富了伊斯兰法的内容,扩展了伊斯兰法所涵盖的领域,保留了被征服地习惯法的合理成分,使这些地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历史的连贯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减少了帝国政府遇到的阻力,客观上促进了各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

早期伊斯兰法的进步与法学家个人的勤奋和努力密不可分。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至今,法学家始终作为一支强有力的知识分子队伍,在穆斯林社会中发挥着巨大影响,但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影响力,早期法学家(公元7~10世纪)远远超过后来的法学家。在穆斯林世界,早期法学家以信仰虔诚、意志坚韧而著称。他们勇于追求真理,对学术执着痴迷,不为外界诱惑所动,即使是为了一段圣训的出处或一个词的读音,他们也不惜风餐露宿,跋涉万里,直至达到目的。他们善于独立思考,不迷信和盲从权威。著名法学家沙斐仪曾是法学家马立克的学

生,但他并没有一味地追随老师,而是不断地提出新的见解,终于另立门户,创立沙斐仪学派,与老师的马立克学派一起,跻身于伊斯兰四大法学派别之列。类似例子,在伊斯兰法学史上不胜枚举。

早期法学家重视法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作为学者,法学家与社会接触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游历,二是讲学,三是担当某种职业角色。穆斯林帝国的不断扩大为学者们的游历提供了交通便利和安全保障,他们或利用朝觐或通过求学,或跟随军队,观察各地风土人情,搜集史料,整理各种疑难问题,使学术研究具有丰富的感性资料。当他们设帐讲学,他们的学生便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学生有着不同的民族和社会背景,其中有黑人,有白人,有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有游牧民,也有农民,有奴隶,有平民,甚至也有贵族……他们汇集了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种身份,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的各种问题带到学校、清真寺,组成一座座流动图书馆和信息库,对法学家的研究活动既产生了空前压力,又提供了充裕的内容和动力。有些法学家还亲自将研究和身体力行结合起来。哈奈菲学派创始人艾卜·哈尼法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又积极从事经商活动。他经常出入市场,了解行情,寻找问题,并将解决方法与自己的布匹生意结合起来,检验各种商业法规的社会效用。有许多法学家同时担任法官职务,从事司法实践,丰富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著作。艾卜·哈尼法的大弟子艾卜·优素夫曾长期担任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大法官,其间他的法学思想更趋成熟,进一步完善了哈奈菲派学说,他在任期间著作的《赋税论》,对后来的穆斯林国家财政税务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6]

早期伊斯兰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同时,各个法学派别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伊斯兰法理学逐渐趋于统一。法学家沙斐仪博采众长,潜心著述,写成《母典》一书,该书弥合了经训派和意见派之间的分歧,统一了各派的法学规范。他的《法源论纲》通过系统论述,确立了古兰、圣训、公议和类比作为伊斯兰法渊源的最终地位,成为教法原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沙斐仪的著作集早期伊斯兰法学之大成,代表了早期伊斯兰法学的最高成就。法学原理的统一更加促进了穆斯林帝国法律和立法活动的发展。

早期伊斯兰法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法律体系,比较成功地协调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为帝国的发展提供了非物质性支持,为帝

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伊斯兰法衰变的原因探析

公元 9 世纪, 伴随阿拉伯帝国达到鼎盛, 伊斯兰法也进入成熟时期。阿拔斯王朝宣布四大法学派别为正统法学派别, 标志伊斯兰法发展到一个高峰, 但同时, 意味着伊斯兰法开始固步自封, 走向衰落。

“创制大门”被人为关闭, 是伊斯兰法走向衰落的最主要原因。由于早期法学家的个人威望, 以及整个法学发展获得的突出成就, 后来的法学家自惭形秽, 觉得难以望其项背。他们认为, “伊斯兰法学理论和体系已基本定型; 各法医学派已确立; 各种法学典籍均已成书; 法学家的主要职能由法律的创制转向鉴别、比较各学派的观点与主张。”加之有少数法学家滥用“创制”, 炮制出许多对人们宗教信仰和社会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法令律例, 必须对其采取措施, “以维护伊斯兰法的严肃性和实用性”^[4]。于是, 关闭“创制大门”一说开始出现, 并迅速成为法学家中间的主流思想。

创制大门关闭, 伊斯兰法学开始趋于保守, 逐步丧失原先的进取精神。法学家视四大法学派别的学说为法学最高成就, 后人无法逾越。他们将研究工作局限于仅仅是对前辈法学思想的再学习和再注释。学者中间, 因循守旧之风日益蔓延, 学术研究活动内容陈旧, 主题老化, 理论上鲜有突破, 学术争鸣现象已基本消失。四大法学派别在早期象征着法学理论的繁荣和交流, 后来则演变为对权威的迷信和非理性的互相攻讦。至公元 11 世纪, 法学学说教派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这时的法学家及其思想已经囿于门户之见, 不思进取, 伊斯兰法学进入僵滞阶段。

内容上, 伊斯兰法由开放转向封闭。阿拔斯王朝时期, 苏菲主义已经十分盛行, 宿命论在穆斯林中占有一定市场, 教派分化现象也十分突出, 尖锐的教派矛盾使人们格外热衷于对神秘主义和抽象教义的争论。法学家的注意力开始发生偏移, 法学内容突出对宗教义务(如念、礼、斋、课、朝)的分析, 却缺乏对社会新问题、新现象的关注。特别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蓬勃发展, 西方技术与资本涌入穆斯林世界, 伊斯兰法在商业等经济领域仍完全因袭旧的律例, 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变化的需要。

因循守旧, 加上对殖民主义的仇恨, 导致伊斯兰法学家和广大穆斯林产生一种扭曲心理, 对来自非穆斯林的事物采取一概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18 世纪, 奥斯曼帝国已出现全面危机, 吸取西方先进技

术和制度, 进行多方面改革已成必然趋势。1789 年苏丹谢里姆一世即位, 开始学习欧洲经验, 进行军事、教育和财政制度改革, 却遭到了法学家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而告失败。后来的多次改革都由于类似的原因, 未能进行下去, 致使帝国的中兴计划一再受挫, 坐失良机。19 世纪中期, 奥斯曼帝国终于沦为西方殖民地。

10 世纪以后, 法学家逐渐丧失独立的学术品格, 法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四大哈里发时期, 伊斯兰法的解释与创制由圣门弟子完成, 法学家作为一个群体, 尚未完全形成。倭马亚王朝时期, 伊斯兰法迅速发展, 政府对学术活动不加干预, 法官在执法过程中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3]法学家可以大胆提出新的学说, 对各种社会现象发表意见, 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阿拔斯王朝时期, 法学家仍享有充分的学术和创制自由。但阿拔斯家族出于政治目的, 利用宗教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统治者对法学家的控制开始加强, 对他们或者加以迫害, 或者予以拉拢。在此前提下, 法学家群体开始分化, 一部分法学家极力论证现存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合法性, 认为“即使哈里发残暴不义, 臣民也不得反叛”。^[7]从而使哈里发的权力极度膨胀, 腐朽现象滋生, 国家纲纪废弛, 法律地位下降。法学家渐渐退化为新的社会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崇尚清谈, 法学研究蜕变为纯粹的智力游戏, 所探讨的法律内容有许多已落伍于时代需要。但历史上形成的法学家的权威仍然在发挥作用, 法学家以伊斯兰教的维护者自居, 对新事物不切实际地妄加评判, 无形中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早期伊斯兰法也存在许多缺陷, 但在后来未能得到克服, 影响到伊斯兰法的发展。伊斯兰法虽然内容包含广泛, 却缺乏必要的分工。法学家作为法学研究和制定法律的主体, 总表现为“通才”式人物, 他们必须在宗教与世俗、民法与商法、婚姻与刑法、政治与经济各方面均有所涉猎, 法律研究方向的界限十分模糊, 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法律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精确化。此外, 伊斯兰法以法学学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缺乏系统的法律编纂和整理, 导致司法实践很不统一。往往同样的案件, 不同学派的法官有不同判法, 甚至同一派法官, 由于时间或地域不同, 而有差别悬殊的裁决结果。早期伊斯兰法的这些特点, 虽具有灵活性的一面, 但同时也破坏了司法统一及其效力。从经济角度看, 它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

(下转第 95 页)

忧虑,甚至开始怀疑世俗化与西方化的道路是否适合于土耳其,伊斯兰教或军政府控制政治的历史是否会卷土重来,土耳其能否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能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体系。这一切说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任重而道远,如何均衡各种权力,如何应对变化多端的严峻挑战是摆在土耳其当局面前最紧迫的任务。但可以肯定土耳其未来政治的发展仍将以世俗主义为基本原则,世俗与宗教的二元对立也仍将是土耳其社会的基本特征。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土耳其是一个充满了对立和否定的统一体,是一个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国家,^[8]它一方面努力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将坚持“欧洲定位观”,依然沿袭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改革道路。作为中东发展现代化的“个案”,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发展还有待于长期的实践来检验。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 90 页)

的形成,思想上又助长了穆斯林中的宗派主义倾向。曾经有人很早就指出这一不足,并号召由权威人士制定出一项各地法官都应遵照执行的法律,即制定法律通典,可惜未能得到响应^[3]。只是到 18 世纪以后,西方法律随殖民主义侵入东方,穆斯林世界才被迫实行法律的分工,制定各部门法律通典^[8]。

当然,伊斯兰法的衰落也有客观原因。阿拔斯王朝中期,穆斯林帝国即出现分裂。各地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交通阻塞,经济萧条,生产破坏,文化事业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和安定的环境。伊斯兰法学家面对现实困境,消极低沉。许多学者转向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或者干脆隐居避世,法学研究活动进一步与现实分离,伊斯兰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伊斯兰法在经过长期衰落僵滞之后,到 20 世纪又出现复兴,主要标志是“创制大门”重新打开。近代,尤其自 19 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出于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维护伊斯兰教纯洁和尊严的立场,开始深刻的自我反省,“创制大门”是否关闭的争论重新出现。学者们认识到,为了使伊斯兰重新焕发活力,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必须重新开启“创制大门”,对经训做出合乎现代精神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穆斯林国家的立法工作。这一活动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开始缓慢启动,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四大法学派别之间的壁垒有所打破^[8],西方立法方式(比如民法典编纂)被逐渐采用。然而总的来说,这时开启“创制

参考文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 [2] 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4] 彭树智.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5] 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6]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7] 杨鲁萍.全球化与中东政治制度民主化[J].西亚非洲,2001,(6):37—40.
- [8]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大门”已经无济于事,无法挽救穆斯林世界免遭西方殖民侵略和压迫。进入 20 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赢得独立。这时候伊斯兰法学才真正获得独立思考的机会,创制在伊斯兰法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成为穆斯林世界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力武器,伊斯兰法学藉此而重新显示出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 [1]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 马坚译.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3]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三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4] 马明贤.伊智提哈德——伊斯兰法的创制[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3):80—83.
- [5] 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 [6] 丁俊.伊斯兰文化巡礼[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7] 吴云贵.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
- [8] Oussama Arabi, Contract Stipulations in Islamic Law: The Ottoman Majalla and Ibn Taymiyya[Z]. *Middle East Studies*, 1998, (30).

[责任编辑 杨彬智]